

# 伊朗核问题与大国的利益博弈

刘国华

西华师范大学讲师

近来，伊朗核问题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伊朗核问题为大国提供了一个利益博弈的舞台。美国和欧盟与俄罗斯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有差异。伊朗核问题如何解决，主要取决于伊朗和美国的態度及其相互关系的演变，也同欧盟和俄罗斯的政策密切相关。



美国和伊朗是围绕伊朗核问题较量的主角。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伊斗法，是两国近 30 年来政治、经济、军事争斗的尖锐化表现。

从伊朗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扣押美国外交官人质事件起，伊美两国即从盟友变成敌人。此后二十几年中，美伊关系处于紧张对立状态。美国从独霸中东出发，把伊朗伊斯兰政权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美国对伊朗竭尽打压、颠覆之能事，对伊实行严格的全面经济制裁和封锁。这使伊朗政治上陷于困境，经济上一度几陷崩溃边缘。“多亏”美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忙于对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和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伊朗才得以重整旗鼓，趁机修复与美国以外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与欧盟的关系，使其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同时伊朗还悄悄研发了自己的导弹系统和其他军事装备，军事力量得到很大加强。

2003 年美国发现伊朗在秘密发展核计划后，

又将矛头对准伊朗并着力加以打压。因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非同小可，有可能毁掉美国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中东总体战略。尽管伊朗政府不断明确表示，发展核技术只用于和平目的，而且其铀转化设施和铀浓缩活动只处于初级阶段，离造出武器级铀，尤其是离制造核武器还有很长距离，但伊朗的核活动，特别是伊宣布已成功提炼出低纯度浓缩铀之事令美国大为震动。在美国看来，虽然伊朗一再声称核计划是为和平用途，但发展核武器是其既定目标，且其实现拥核武目标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提炼低纯度浓缩铀技术与提炼高纯度浓缩铀技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差距。伊朗既已掌握了提炼低纯度浓缩铀技术，它提炼出能制造原子弹的高纯度浓缩铀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种前景是美国绝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美国对伊朗提炼浓缩铀活动做出了强烈反应，对伊软硬兼施，迫其放弃拥核计划。一方面，美认为当前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是最佳选择，并通过安理会“五常”加德国这六大国提出解决伊核问题方案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敦促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另一方面，在伊朗坚持强硬立场，强化铀浓缩活动的情况下，强化对伊朗的制裁和军事压力。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甚至表示，一切可能性都在考虑之中，包括军事行动。<sup>[1]</sup>在国会，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的声浪持续升高，主战派的声音明显占据了上风。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明确表示，一旦外交努力失败，美国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民意调查也显示，在外交努

力失败的情况下,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使用军事手段的高达 55%。<sup>[2]</sup>

美国决不允许伊朗掌握核武器,其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维护和确保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独家主导地位。

中东是世界能源的中心产区,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一直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扩张的重点之一。在中东这样重要的战略地区,美国决不希望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地区大国来挑战其在这一地区的独家支配地位。伊朗是中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国,是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其中远程导弹射程可达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目标。伊朗现在又是中东地区惟一敢于公开与美国作对的国家。伊朗一旦掌握核技术,无异如虎添翼,将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致命威胁。美国还担心如果伊朗拥核,可能打开恐怖主义组织拥有核武器的潘多拉之盒,不但祸害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而且其本土的安全也会面临难以想像的严重威胁。

第二,打击以致终结伊朗伊斯兰政权的需要。

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搞垮其伊斯兰政权,在伊朗建立亲美的世俗政权。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事实上美国对伊朗的仇恨超过对萨达姆的反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一个目的是要在中东树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样板,以突出伊朗的专制,鼓励伊朗人民推翻现政权,甚或为攻打伊朗铺平道路。在美国看来,伊朗推行仇视和反对美国及以色列的政策,支持巴勒斯坦和哈马斯及黎巴嫩真主党等极端组织,支持和赞助恐怖主义,是中东地区的“祸源乱始”,是对美国中东战略的最大威胁和挑战。美国还认为,伊朗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中心,是伊斯兰世界反美活动的策源地。因此,美国把伊朗看作是一个比伊拉克还值得警惕的国家。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说:“伊朗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发起国……伊朗谋求制造核武器是核扩散的主要危险……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就是要使用外交和经济措施,以及军事威慑来遏制伊朗。”

<sup>[3]</sup>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控制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军事上对伊朗形成夹击之势。美国如果在核问题上能迫伊朗就范,就可以大挫伊朗政权的士气,大降其在伊朗民众中的信誉与声望,为其倒台创造条件。

第三,通过伊朗核问题,实践其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改造。

布什政府自上台以来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势头,在“9·11”事件后更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主导国际反恐活动,将反恐范围扩大到防扩散领域。在 2003 年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首次提出,“美国 and 全世界面对的最严重危险是寻求和拥有核生化武器的非法政权。”<sup>[4]</sup> 美国认为,现存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已不能适应业已变化了的安全威胁,不能满足新的世界安全环境的客观需求。所以,美国竭力要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改造为美国建立由其主导的新的世界安全秩序的政策工具之一。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实践其改造这一机制的一次主动出击。美国在伊朗、朝鲜核问题上咄咄逼人的行动是其为推进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新的战略举措。

第四,为其盟国以色列消除战略威胁。

以色列是世界上最亲美的国家,美国也把以色列作为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支轴与“不沉的航母”。美以两国形成了世界上最亲密的盟友关系。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守护者”,而美国是以色列安全的庇护者和保证者。美国公开把维护以色列的安全作为其国家义务与责任,每年给以提供 20 亿美元的巨额援助,用最先进的武器将以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美国将以色列看作自己国土的延伸,把以色列的安全看作是美国本土的安全,在外交上到了以以色列划线的地步。而伊朗是中东地区以至全世界最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尤其在內贾德上台以后,伊朗视以色列为“不共戴天”之敌,对以政策变得空前强硬。內贾德不仅拒绝承认以的存在,还声称要把以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从地图上抹掉”。伊朗导弹可以打到以色列全境,如果伊掌握核武器,对以色列的威胁更是致命的。这是美国决不能容忍的。

对伊朗来说,实施核计划,掌握核技术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选择,不会轻易放弃。其主要考虑有三:其一,将拥核作为对付美国威胁,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盾牌。在过去的20多年,历届美国政府从来都毫不掩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厌恶和仇视。孤立、削弱乃至颠覆伊朗现政权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进入21世纪,尤其是“9·11”事件后,伊朗面临美国更加严峻的挑战。“伊朗对安全的担忧主要源于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主要盟友以色列的敌视政策。加重这种担忧的是美国在海湾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它在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的军事存在。与此同时,伊朗还担心美国与土耳其结成的敌视自己的军事同盟。”

<sup>[5]</sup> 美国在完成了在伊朗周边国家的战略布局后,伊朗事实上已成为美国势力围堵下的一个孤岛。同时,拥有中东地区最强大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的以色列不时向伊朗叫板,甚至进行武力威胁。伊朗认为只有拥有特殊的防卫手段才能使美、以不敢轻举妄动。

其二,以拥核作为实现强国目标的关键工具。伊朗在历史上一直是海湾和中东大国,有称雄一方的传统。在上世纪70年代末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伊朗推行伊斯兰革命输出政策,向外扩展自己的势力和影响。由于搞“革命输出”受到广泛诟病与抵制,特别是两伊战争和美国制裁使其大伤元气,伊朗调整政策,停止“输出革命”,但其始终没有放弃充当强国、扬威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目标。伊朗把大力加强军备,发展核技术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

其三,实施多样化能源战略的需要。伊朗虽然是石油大国,由于大量出口及自己发展经济和国防耗油量,其石油资源被迅速消耗。为保障能源长期供给,伊朗未雨绸缪,大力发展核能。伊朗一再声称其发展和掌握核技术是为了和平用途,这并非托词,而是反映了其实际需要。

实施核计划是伊朗既定的战略选择,也是其在核问题上难以更改的底线。伊朗领导人在2006年两次拒绝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要伊朗限期停止

铀浓缩活动,否则要予以制裁的决议,一再重申任何压力都不会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伊朗决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

从伊朗强硬立场可以看出,拥有和维护提炼铀浓缩的能力和权利是其既定方针。而不让伊朗提炼高纯度浓缩铀即剥夺伊朗拥核能力是美国的政策底线。双方都难以从各自的底线后退。美伊围绕伊核问题的争斗僵局一时难以打破,双方的对立和较量仍将继续。



伊朗核问题主要是伊朗同美国的较量,其如何解决主要取决于美伊较量的结果。但美国同其他大国主要是同欧盟及俄罗斯的利益博弈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欧、俄的态度对伊核问题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 (一) 欧盟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利益博弈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尤其是核扩散是欧盟的核心关切之一。伊朗核问题更引起欧盟的高度关注。伊朗所在的中东地区是欧洲的战略侧翼和主要能源基地,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攸关欧盟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伊朗发展和掌握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就可能打开中东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魔盒,给本已紧张、动荡的中东局势火上浇油,甚至使其有失控之虞;更严重的是,欧洲大陆有朝一日可能会笼罩在伊朗核打击威胁的阴影之下。这是欧盟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不让伊朗发展核武器,消除其潜在的核威胁这一问题上,欧盟同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围绕解决伊朗核问题,欧盟与美国之间一直进行密切的协调与合作。

欧盟作为伊核问题“利益攸关者”,始终致力于促进该问题的妥善解决。从欧盟参与斡旋过程看,在对待伊朗核问题上,它与美国虽有相同的目标,但也存在利益博弈。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东与美国天各一方,



相距遥远，而与欧洲山水相连，是欧盟的战略侧翼与安全屏障和隔海相望的“后院”。中东不稳定及由此引发民族和宗教仇视、社会动荡、难民潮和恐怖袭击，直接波及和冲击的是欧洲而不是美国。从经济的角度看，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对欧盟经济的影响大于对美国的影响。“西欧的安全与繁荣仰仗中东，特别是中东的石油战略资源。”<sup>[6]</sup>与美国石油供应多元化相比，欧盟更依赖中东。欧盟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消耗量的52%。从穆斯林移民看，其在欧盟国家的数量与影响大于美国。欧盟成员国内大量穆斯林人口，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如果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上一味追随美国，不但会丧失穆斯林民众对欧盟政策的支持，还会引火上身，导致国内局势不稳定。近年来在英国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嫌疑犯都是在英国长大的穆斯林裔青年。他们憎恨英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追随美国，派兵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英国因而成了他们报复袭击的主要对象。同时，欧盟同美国在中东和世界战略格局观上利益相左。美国凭借独超实力，谋求独霸天下，把在中东确立其单极主导作为实现由其独家支配的单极世界目标的重要支点。而欧盟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切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与其实力地位相匹配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致力于在西方联盟中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成为中东事务的主角之一和世界战略格局中的独立一极。单极与多极之争是美欧矛盾的一个突出方面。如果完全按照美国意旨解决伊朗核问题，伊朗有可能像伊拉克一样被纳入美国主导的轨道，从而为美国独家主宰中东打下更牢固的基础，而欧盟只能在中东居于配角地位。这是不符合欧盟战略利益的。

所以，在伊朗核问题上，欧盟既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以免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和武装冲突，使本不平静的中东局势更加动荡，又主张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即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通过“核查”、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危机，不同意美国像对待伊拉克一样，过分夸大其威胁程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欧盟还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会增强伊朗保守派的势力，使其加大对

中东和北非恐怖主义的支持。欧盟更担心这会更加激化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和谋求独家主导中东和国际事务的行动，从而削弱欧洲的作用和影响。伊拉克战争之后，欧洲许多国家一直在思考，在解决重大国际危机中，欧洲首先必须考虑自身的战略利益，不能完全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要运用欧洲的软、硬实力，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欧盟就是抱着这种心态介入伊朗核问题的处理，积极同伊朗展开谈判。在欧伊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欧盟调整政策，试图借助联合国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来。欧盟始终坚持与伊朗进行严肃对话，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由于欧盟的主张相对温和、务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伊朗和平利用核能，伊朗一直愿意向欧盟敞开谈判之门。欧盟的立场和努力有利于推动伊朗核问题的合理解决。

## （二）俄罗斯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利益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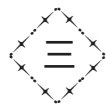
伊朗是俄罗斯重大的“利益相关者”，伊朗核问题与俄罗斯利益紧密相连。俄罗斯在处理伊朗核危机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问题上，俄罗斯的利益在不少方面同美国的利益有较大差别，甚至是对立的。其一，在地缘政治上，因为伊朗紧靠俄南部边界，接近俄的战略腹地，俄伊关系状况以及伊的对外关系状况直接牵动俄的地缘战略全局。因此，俄格外警惕美国对伊朗的地缘战略图谋。虽然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美国不再是争夺世界霸权与激烈对抗的敌手，但实际上双方仍将对方视为对本国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主要潜在战略对手。因此，美国坚持对俄实施全面的战略挤压。美通过北约东扩和对中亚进行深入渗透，已从东西两面对俄进行战略围堵。惟独在南翼由于伊朗存在反美政权，美在对俄实行战略牵制方面无所作为。美所以在伊朗核问题上大做文章，其目的之一是要以此为突破口，在伊实施改朝换代，建立亲美政权，把伊纳入美的地缘战略版图，并从南面对俄形成战略钳制。如果美国的战略盘算得逞，那对俄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战略损害。这是俄罗斯要竭力避免的。俄罗斯对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根本目标是既要防止伊朗拥

有核武，又要阻止美国实现其控制伊朗的政治图谋，即阻止美国将伊朗现在的亲俄反美政权演变成疏俄亲美政权。其二，在经济领域，俄在伊朗有重大利益。首先，伊朗是俄先进武器的主要买主。仅在2005年11月俄伊签订的一项军火交易合同，俄向伊朗出售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售价即达14亿美元。其次，俄罗斯是伊朗核电站的主要供应者。伊朗从自身长远发展着想，大力开发核能源。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担心伊朗将民用核技术转化为军用，对伊进行核能封锁，伊只得依靠俄罗斯帮其建设核电站。伊朗布什尔等几个核电站的设备、技术和专家就是由俄罗斯提供的。双方在这方面成交的合同总额达数十亿美元之多。再次，两国有地理邻近之便，经贸关系密切，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美国则长期与伊朗交恶，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和封锁，与其中断了经贸联系。其三，在大国影响方面，俄美在伊朗核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出发点。普京总统以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为己任，在国内加紧振兴经济，提升俄的实力水平，在国外大力扩大俄的影响。为此，俄除紧抓对独联体的主导权之外，还把加强在其南翼近邻中东地区的影响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一个重点。扩大在伊朗的影响又是俄中东政策的一个重点。美国则凭借其超强实力，竭力独主中东沉浮，只让俄罗斯在配合其战略目标的框架内发挥作用，不让俄分享其在中东的主导权，在伊朗核问题上也是如此。俄罗斯当然不愿甘当美国的随从，完全配合美国的行动，而要在中东事务尤其是在处理伊朗核危机上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这既是俄战略利益所在，也是俄作为一个大国的声望所系。

由于俄美利益不同或相左，双方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立场有明显差别。俄与美存在两大原则分歧。一是尽管俄在伊朗违犯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情况下同意联合国对伊实行一定制裁，但反对美国对伊实施全面和严厉的制裁主张；二是俄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最近，就在美国向海湾增兵，基本上完成了进攻伊朗的军事部署，波斯湾上空战云密布之际，俄罗斯宣布完成了向伊朗提

供“托尔-MI”防空导弹系统的合同，极大地增强了伊朗的空防能力。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对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是一个牵制。

另一方面，俄罗斯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也有利益交汇之处，那就是双方都反对伊朗发展和拥有核武器。俄官员曾强调说，作为伊朗的邻国，俄罗斯比美国更加希望伊朗保持无核化，绝不希望在自己家门口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的国家。<sup>[7]</sup>伊朗发展核武器既对俄地缘战略安全不利，又会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损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是俄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在解决伊朗核危机方面，俄同美国进行了一定的协调与合作。在伊朗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坚持增加离心机数量，加紧提炼浓缩铀的情况下，2006年俄罗斯在安理会先后投票赞成通过对伊朗实行有限制裁的联合国第1696号决议和第1737号决议。但是，俄罗斯对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底线即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这一根本立场不会改变。俄美之间围绕伊朗核问题既协调又较量，既合作又牵制的关系态势将继续下去。



目前，伊核问题大有演变成一场“危险游戏”之势。总体看，伊朗核危机不外乎有三种结局：美伊硬碰硬，海湾再来一战；美国赢得一边倒支持，国际社会联手制裁，逼伊就范；积极斡旋，就伊朗核问题达成相互妥协的和解协议。

当前第一种结局的可能性增大。在联合国于2006年12月23日通过第1737号制裁伊朗的决议后，美国的态度更趋强硬，强化了在海湾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形成了对伊朗随时可以进行军事打击的态势。尽管如此，美国难以对伊朗进行军事摊牌。布什当政以来，已经打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虽然美国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可战后却一团乱局，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时至今日，拉登的“基地”组织以及塔利班势力仍在阿富汗不断闹腾；而伊拉克更是硝烟四起，爆炸声

不绝,走到了“内战”边缘。在此情况下,布什即使再莽撞,不会轻启对伊朗的战端。伊朗不是伊拉克。它既拥有比伊拉克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政局又较稳定,民心士气较旺。美对其军事打击难以轻易得手,可能还会付出沉重伤亡的代价。伊朗还有石油牌可打。一旦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伊朗将通过减少石油出口来哄抬国际原油价格,从而使国际原油价格火飙升。伊朗还可以中断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使美国和西方遭遇新的石油危机。据美国的兰德公司评估说,如果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3个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4%-5%,失业率将上升2%。<sup>[8]</sup>同时,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盟国普遍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担心,美国对伊朗动武之时,也许就是整个穆斯林世界与西方全面冲突的序幕拉开之日。从伊朗方面看,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凶多吉少。因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差悬殊,一旦爆发战争,伊朗可能要吃大亏,甚至整个国家和民族要遭难蒙羞。因此,伊朗在发展核武问题上仍留有余地。

再看联手制裁。且不说安理会“五常”立场不一致,俄罗斯将会否决美国有关对伊实行全面严厉制裁的主张,就连英法德意这四个美国的重要盟国也不完全和美国一个鼻孔出气。安理会中没有否决权的其他非常任理事国的态度也不可忽视。由于美国在黎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安理会曾在很长时间内在这一冲突问题上无所作为,联合国的形象和权威受到损害,很多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对美国心存不满。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美国试图在安理会推销美式制裁伊朗的方案时,有可能会面对这些国家“反弹”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制裁是把“双刃剑”,很难把某个国家孤立起来而不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更何况伊朗这样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伊朗与许多西方国家都有密切的经济往来,石油禁运固然会破坏伊朗经济,但也会造成世界油价飙升,不仅会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也同样会受害。在联合国无法通过全面制裁伊朗的决议的情况下,即使

美国一意孤行,在联合国之外联合某些盟国共同制裁伊朗,也难以奏效。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目前没有外交关系,美国也一直在对伊朗实施一系列的经济制裁,这些都没有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

因此,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才是上上之策。这是惟一符合各方利益的最佳选择,也是惟一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最明智解决办法。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钥匙掌握在主要当事人美国和伊朗手里。两家主政者的强硬政策在国内外都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2007年1月18日,在布什政府增兵海湾之际,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提出如果布什要对伊朗动武,必须得到国会批准,不得搞“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这对布什可能的战争行动是一大牵制。在联合国通过第1737号制裁伊朗的决议后,伊国内包括政界上层出现了批评和抨击内贾德总统在核问题上持强硬路线的声浪。布什和内贾德所代表的政党或派别分别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伊朗地方选举中落败,是对其包括在伊核问题上所持强硬路线的一大警示和打击。特别是如果双方强硬到底,导致局势失控,最终爆发战争,双方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这对双方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经过权衡利弊,在国内外压力之下,美伊当局最终适度调整强硬政策,找到互相妥协的平衡点,从而导致伊朗核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有现实可能的。而欧俄同美国在伊核问题上存在利益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正面因素,对美国的强硬政策造成一定的对冲与牵制,也有利于促进伊朗核危机走向缓解与合理解决。

注 释:

[1] 王湘江:《伊朗核问题:“期限”过后会怎样》,新华网,2006年8月30日。

[2] 王宝付:《伊核危机牵动大国博弈》,《瞭望》,2006年2月13日Z1。

[3] Joseph Cirincione, "How will the Iraq War Change Global Nonproliferation Strategies?" *Arms Control Today*, April 1, 2003, P.5.

[4] 王京烈:《面向21世纪的中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70页。

[5] Seyed Hussein Mousavi S. 'Defense' (下转第54页)



国欢迎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不愿由中国掌握六方会谈和解决朝核问题的主导权。因此，中国缺乏足够的“杠杆”改变布什政府目前依然强硬的对朝政策，无法完全掌控朝核问题的冲突管理进程。

### 三 量化标准的缺乏与冲突管理时机把握上的难度

在时机的问题上，“相互伤害”的程度如何确定？成熟时机如何把握？冲突当事方不同的认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朝核冲突问题上，如果有一个当事方认为冲突还没有到达伤害的最高点、继续冲突还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则其接受冲突管理的意向就减弱。如果当事方感到冲突升级可能引发对抗，将给自身带来可怕后果，则其接受冲突管理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这个“度”和接受管理与否的选择权掌握在冲突方手里。由于确定这个“度”和做出选择有较大难度且双方不一定会有同一的选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冲突管理的有效进行。这也是造成六方会谈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实施冲突管理的有关条件包括冲突方的意愿等诸因素是可变的，而不是恒定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随着形势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变化既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即使是负面变化也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引向正面。从总体看，尽管目前朝核问题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但通过六方会谈达成和平解决的前景还是存在的。其一，以对抗和武力手段解决朝核冲突是当事方难以承受之重，而坚持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符合各

方的根本利益，相信朝美双方最终会做出明智选择。其二，在朝鲜核试验之后，鉴于其极其严重的后果，双方增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紧迫感。美国多次声称愿意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而朝鲜也重申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改变，依然希望通过会谈解决问题。其三，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是民主党大胜，重新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是对布什政府强硬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沉重打击。美国政坛力量对比态势的改变，将有利于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久前举行的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朝着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注 释：

[1] Niklas Swanström,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the Pacific Rim* (Department of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Uppsala University, 2002), p.20.

[2] *Ibid*, p.452.

[3] Fen Osler Hampson, 'Why Orphaned Peace Settlements Are More Prone to Failure,' in *Managing Global Chaos: Sources of and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d. Chester A. Crocker & Fen Osler Hampson with Pamela Aall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6), p.534.

[4] Jacob Bereovitch,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Overview of Theory, A Review of Practice', in *Peacemak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ethods & Techniques*, ed. William I. Zartman and Lewis J. Rasmusse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p.145.

[5] 2005年2月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发言。[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congress/2005\\_h/050217-sutter.pdf](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congress/2005_h/050217-sutter.pdf).

[6]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10/18/content\\_1542076.htm](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10/18/content_1542076.htm).

[7] 林利民：《朝核危机管理与中国的外交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



(上接第49页) Policie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Discourse An Iranian Quarterly*, Vol.2, No.4, spring 2001, P.57.

[6] 王京烈，《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7] Talal Nizameddin,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Towards New Foreign Policy*, Hurst & Co., 1999, PP.237-239.

[8] 郭京花，《伊朗核问题中的大国因素》，《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4)。